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
中国道路丛书·译丛

谁是世界的威胁

从历史的终结
到帝国的终结

[意] 保罗·乌里奥 著
(Paolo Urio)

法意 译

世界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我们亲历的将不是历史的终结，
而是帝国的终结

中信出版集团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
中国道路丛书·译丛

谁是世界 的威胁

从历史的终结
到帝国的终结

[意] 保罗·乌里奥 著
(Paolo Urio)

法意 译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我们亲历的将不是历史的终结，
而是帝国的终结

中信出版集团

谁是世界的威胁：从历史的终结到帝国的终结

作者：（意）保罗·乌里奥

译者：法意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11

ISBN：978-7-5217-5794-1

“中国道路丛书”学术委员会

学术委员会主任：孔 丹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 耘 马 戎 王小强 王绍光 王海运 王维佳

王湘穗 方流芳 尹韵公 甘 阳 卢周来 史正富

冯 象 吕新雨 乔 良 向松祚 刘 仰 刘小枫

刘纪鹏 刘瑞生 玛 雅 苏 力 李 玲 李 彬

李希光 李若谷 杨松林 杨凯生 何 新 汪 晖

张 宇 张文木 张宇燕 张维为 陈 平 陈春声

武 力 罗 援 季 红 金一南 周和平 周建明

房 宁 赵汀阳 赵晓力 祝东力 贺雪峰 聂庆平

高 梁 黄 平 黄纪苏 曹 彤 曹和平 曹锦清

崔之元 梁 晓 彭光谦 韩毓海 程曼丽 温铁军

强世功 蒲 坚 熊 蕾 潘 维 霍学文 戴锦华

编 委 会

主 任： 孔 丹

执行主任： 季 红

“中国道路丛书”总序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以来，中国一直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中，努力寻求既发挥市场活力，又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势的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的崛起。怎样将中国的发展经验进行系统梳理，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体系，让世界理解中国的发展模式？怎样正确总结改革与转型中的经验和教训？怎样正确判断和应对当代世界的诸多问题和未来的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都是对中国理论界的重大挑战。

为此，我们关注并支持有关中国发展道路的学术中一些有价值的前瞻性研究，并邀集各领域的专家学者，深入研究中国发展与改革中的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编辑和出版反映与中国道路研究有关的成果，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的系列丛书。

“中国道路丛书”的定位是：致力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模式的研究和理论创新，以此凝聚社会共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立足中国实践、通达历史与现实、具有全球视野的中国学派的形成；鼓励和支持跨学科的研究和交流，加大对中国学者原创性理论的推动和传播。

“中国道路丛书”的宗旨是：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

始终如一地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总结中国经验、探讨中国模式，应注重从中国现实而不是从教条出发。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正确认识中国的发展方向，都离不开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通过实践推动认识的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世纪奋斗历程中反复证明了的正确认识路线。违背它就会受挫失败，遵循它就能攻坚克难。

毛泽东、邓小平是中国道路的探索者和中国学派的开创者，他们的理论创新始终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同时因应世界的变化。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他们从来不生搬硬套经典理论，而是在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摒弃无所作为的思想，拒绝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只有实践才是真知的源头。“中国道路丛书”将更加注重理论的实践性品格，体现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鲜明特点。

坚定不移地践行中国道路，也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理论挑战，例如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彼此割裂和截然对立的评价，再如极力推行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等错误思潮。道路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们的改革目标和道路是高度一致的，因而，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百年兴衰、大国博弈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从积贫积弱的状态中奋然崛起，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成就斐然，道路独特。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一定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路，这是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

推动社会科学各领域中国学派的建立，应该成为致力于中国道路探讨的有识之士的宏大追求。正确认识历史，正确认识现实，积极促

进中国学者原创性理论的研究，那些对西方理论和价值观原教旨式的顶礼膜拜的学风，应当受到鄙夷。古今中外的所有优秀文明成果，我们都应该兼收并蓄，但绝不可泥古不化、泥洋不化，而要在中国道路的实践中融会贯通。以实践创新推动理论创新，以理论创新引导实践创新，从内容到形式，从理论架构到话语体系，一以贯之地奉行这种学术新风。我们相信，通过艰苦探索、努力创新得来的丰硕成果，将会在世界话语体系的竞争中造就立足本土的中国学派。

“中国道路丛书”具有跨学科及综合性强的特点，内容覆盖面较宽，开放性、系统性、包容性较强。其分为学术、智库、纪实专访、实务、译丛等类型，每种类型又涵盖不同类别，例如在学术类中就涵盖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战略学、传播学等领域。

这是一项需要进行长期努力的理论基础建设工作，这又是一项极其艰巨的系统工程。基础理论建设严重滞后，学术界理论创新观念不足等现状是制约因素之一。然而，当下中国的舆论场，存在思想乱象、理论乱象、舆论乱象，流行着种种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安定团结的错误思潮，迫切需要正面发声。

经过六十多年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基和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迫切需要形成中国本土的理论创新和中国话语体系创新，这是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国际上争取话语权所必须面对的挑战。我们将与了解中国国情，认同中国改革开放发展道路，有担当精神的中国学派，共同推动这项富有战略意义的出版工程。

中信集团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曾经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它不仅勇于承担大型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同时也勇于

承担政治责任。它不仅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同时也是中国道路的践行者。中信将以历史担当的使命感，来持续推动中国道路出版工程。

2014年8月，中信集团成立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构建平台，凝聚力量，致力于推动中国改革发展问题的研究，并携手中信出版社共同进行“中国道路丛书”的顶层设计。

“中国道路丛书”的学术委员会和编委会，由多学科多领域的专家组成。我们将进行长期的、系统性的工作，努力使“中国道路丛书”成为中国理论创新的孵化器，中国学派的探讨与交流平台，研究问题、建言献策的智库，传播思想、凝聚人心的讲坛。

孔丹
2015年10月25日

致谢

许多人为我的中国改革研究提供了帮助，这些人里有学者、研究人员、学生、公务员干部以及我在多次中国访问之旅中遇到的普通中国人。我没有办法一一列举这些为我提供帮助的人，但在我之前的作品中，我已肯定了他们对我了解中国所做出的宝贵贡献。在这里，请允许我特别感谢几位对我有着特殊帮助的人。

一个是我在清华大学的同事胡鞍钢。我第一次和他会面是在1997年，在此之后他一直鼓励我研究，为我提供建议，帮我查阅未发表的论文，向我引荐他的同事等。胡鞍钢教授的研究团队一直为我提供后勤和学术支持，其中我尤其感谢王其珍女士。自2016年我去清华大学时起，她就一直为我的写作提供帮助。她在后来去英国攻读博士学位时，还帮助我更新了本书的附录统计表，并针对本书第二章中我对中国意识形态的分析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还要感谢在2012年至2017年担任我研究助理的陈亚丽女士。那段时期她攻读完了日内瓦大学的性别研究博士学位，开始对移民到瑞典的中国妇女在当地的融入问题展开研究。在我对中国文化所做的分析中，她提出了非常有趣的见解。

另外，我还要感谢之前为我出版图书的出版商：劳特里奇（Routledge）于2018年出版了我的著作《无声的变化：中国重新成为世界大国的战略选择》（China Reclaims World Power Status: Putting an end to the World America Made），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于2019年出版了我的著作《1949—2019年的中国：从历史的终结到帝国的终结》（China 1949-2019: From the End

of History to the End of Empire) 。这使我能够以这些作品作为起点，在本书中得以引用其中的部分内容，并加入一些新的见解。我通过分析美国对中国的一些错误看法，对中国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更详尽的阐释，提出新的观点，并对过往著作中的数据进行更新。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一如既往地支持我、帮助我，为我做出的巨大贡献。身为英国人的她帮助我修改我的英文表述，使它变得更加地道。除此之外，明晰 (Clarity) 出版社的主编戴安娜·G.科利尔 (Diana G.Collier) 也向我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这为我修改书稿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如果细心的读者们从本书中发现任何错误、遗漏和误读，我对此负全部责任。

引言

许多读者，包括学者和大众读者，也许会认为本书是反美的。然而，我批判的不是美国，而是美国建制派，且这种批判不是一种肤浅而情绪化的抨击。自美国独立以来，其外交政策的方方面面都展现了强大的自信，我对这种自信的来源进行了深究。因此，说本书是反美国建制派更为确切。

我生于1940年，我们这一代欧洲人，对美国的印象十分正面。美国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伟大贡献，美国电影、美国音乐包括爵士乐、格伦·米勒、贝西伯爵、艾灵顿公爵、本尼·古德曼、摩天大楼、高速公路、可口可乐、阿伯特与科斯特洛、自由、民主，这些都使我们对美国文化印象深刻。至少在我的家乡瑞士南部，二战之后，反对美国的只有共产党人和左翼社会主义者。在孩童时代，我曾目睹身穿统一制服的美国士兵应瑞士政府要求解除武装跨越瑞士国境，那时的美国令人赞叹。在20世纪50年代，还是青少年的我非常喜爱美国的摇滚乐、歌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现代爵士四重奏，也钟爱《巨人传》《影子》《春风秋雨》等反种族歧视题材的电影。

1971年，我第一次踏上美国国土，到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参加一个政治科学暑期项目。在项目中，我认识了一位和我一样，也曾在日内瓦大学任助教的朋友。他娶了一位美国女士，夫妇俩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简称“加州”）。项目结束后，我们开着他那辆标志性的福特野马汽车从安娜堡市出发，最终到达加州。旅途中，我们先是跨越了美国中西部到丹佛市，然后途经陶斯县、圣塔菲市、亚利桑那州的彩色沙漠，往北探访科罗拉多大峡谷，往西进入拉斯维加斯，后来到达

洛杉矶和圣巴巴拉。那次旅行使我爱上了加州特别是圣巴巴拉。1979年，我把大儿子送到美国参加为期一年的交流学习。他在一个共和党家庭寄宿，男主人是一名律师，在竞选中成功击败在任民主党人成为县总检察长。我的儿子也在竞选过程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四处张贴海报、登门拜访选民，着实体验了一把美国选举。那真是不错的经历。第二年，我携其他家人到美国去接他。我们整个家庭——爸爸、妈妈、四个孩子（分别是10岁、12岁、14岁和17岁）踏上了一次穿越美国的旅程，从首都华盛顿特区到加州，经过丹佛、圣塔菲、亚利桑那州的彩色沙漠、科罗拉多大峡谷、鲍威尔湖、国会礁国家公园、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拉斯维加斯、死亡谷国家公园，然后往北到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往西到旧金山，再往南走一号公路到洛杉矶。旅程的终点是圣巴巴拉，我们在那里休息了一周。这真是令人难忘的假日体验。我们无论到哪儿都受到热情欢迎，在需要帮助时也总能及时得到帮助。我们也体验到了美国人对家庭和孩子的珍视。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第二个10年初，我和妻子在圣巴巴拉度过了许多个美好夏日，也结识了当地不少中产阶层人士，他们为人和善，都不是左翼人士。根据我们的观察，他们都拥有以下特征：心地善良，习惯出国旅行（包括欧洲旅行），为自己是美国人而骄傲，从无半点好斗或居高临下的姿态。我通常不和朋友谈论政治，不过我知道我的这些朋友中有共和党人，也有民主党人，可谓组成了一幅典型的美国中产阶层群体画像：一位大学教授，两位城市学院教授，两位护士，一位地质工程师，一位新教牧师，两位地产中介，一位画家，一位私营企业前高管，以及一位研究墨西哥传统建筑的作家和他的妻子。那么，现在究竟是哪里出了差错？

当然，事情走向不对劲是有一些信号的。朝鲜战争本可起到让美国人民警醒的作用，可惜被美国政府包装成一场“正义战争”；1953年伊朗政变是美国中情局（CIA）策划成功的行动之一，但伊朗首相摩

萨台（任期1951—1953年）被歪曲为共产主义的“特洛伊木马”；接下来又发生了越南战争，这场战争在国际上受到的批评颇多，甚至在美国国内也是如此。但美国主流观点反击称：难道这不是为了阻止共产主义魔爪的延伸而进行的一场正义的战争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苏联解体的历史性时刻，美国外交政策的问题彻底暴露无遗：它施行的理由不仅仅是为了与斯大林做斗争，而且是针对社会主义制度做斗争。苏联解体后，美国领导层认为美国已站上历史巅峰，“历史的终结”终于达成，其他国家很快就会效仿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当然了，这都将在美国的领导下进行。时任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一句言简意赅的话将这种姿态体现得淋漓尽致：“我们说了算。”很显然，这体现了美国的极度自信，而这往往又使其傲慢自大，不尊重其他国家及其人民、文化。

2003年，美国通过伊拉克战争克服了“越战综合征”，从此以后，海外作战成为美国的一种“嗜好”。美国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目前为止仍无可匹敌，海外作战当然胜券在握。然而，除了那场久远的内战，美国从未经历过在本土发生的其他大型战争。1945年，美国击败日本，但也仅限空中和海上作战，而非陆地作战。美国拥有强大的核力量，但日本拥有强悍的陆战军队。为了避免派遣步兵登陆亚洲，美国通过投下原子弹“轻松”地结束了二战。这一决定的其中一个后果是，美国“失去了中国”。在二战之后，美国几乎在所有战争中都遭遇了失败，而这些战争大多数都是侵略性的。

这样的结果是，冷战思维不断升级，世界陷入永无休止的混乱与不确定性之中，充满了仇恨、不信任和敌意，经济战、政变、秘密军事行动愈发频繁，甚至还可能引发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在这样的战争中，派上用场的将会是各国正在争先研发的可怕的现代武器，包括核武器。毫无疑问，俄罗斯和中国都在稳步发展其军备。西方世界通常认为，俄罗斯和中国导致出现了恐慌、混乱、不确定性和敌意。但

我们也可以说，且有正当、充足的理由和证据证明，这些国家发展军备是对美国强大军备的威胁的回应。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利比亚和朝鲜的景况。^[1]在这样的情形之中，西方世界总是套用同一个故事：我们是好人，他们是坏人，那些由“坏人”掌控的“威权主义”国家是对自由民主的威胁，因为它们试图破坏现行的国际社会行为规则。然而，这些规则都是西方世界根据其意志与利益制定的，也是西方世界强加于其他国家的。不过，这样引导舆论会不会反过来威胁到自由民主国家自身的利益呢？如果会的话，到底是谁的利益呢？是民众的利益，还是精英阶层的利益？虽然这些“威权主义”国家并未遵循美国在国家和国际层面推广的价值体系，甚至存在很多严重问题，但难道看不到它们同时也切实改善了民众的生活，不是吗？如果能够首先确保尊重这些国家的主权，并只在必要的时候，也就是这些国家的领导层真正伤害到民主国家及其民众的利益时才去反击，不是更好吗？

我以上所提及的事件都需要进行深度分析和解释，而不是对美国的行为做出肤浅而情绪化的反应。美国有史以来已经多次并且今天依然如此行事，其对自己的民主制度和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极度自信，以令人难以忍受的傲慢态度对待敌人和盟友。而本书就是为了回应这些而写就的。

一直以来，美国为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而制定的外交政策总是带着这样一种目的——保持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其还声称这是整个国际体系“皈依”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后维持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唯一途径。

本书第一章展示了美国在制定外交政策时根深蒂固的一些迷思或谬见，例如坚持“普世价值”的存在，认为当今中国是独裁政权，等等。正是这些认识的存在，让美国政府无法分清幻想与现实，从而无法理性地分析21世纪中美关系的本质。此章旨在解析这些认识。

第二章分别追溯到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和中华封建帝国诞生之初，对中美两国的意识形态发展历史进行分析，进而对中美之间的分歧进行解释。分析表明，美国的意识形态具有极强的内部一致性和时间稳定性，但却极其难以适应国际体系变化。而与之相反，中国虽然也具有极强的内部一致性和时间稳定性，却能够通过将西方思想和儒家价值观相融合来形成新的意识形态，它更具灵活性，更能使其公共政策适应国内和国际的环境变化。同时，这也解释了中国体制无与伦比的韧性。

第三章基于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分析及建议提供了经验实证。

前三章在结构上互相依赖、互相关联，在各章之间或每章之中有不少交叉引用，因此内容重复之处稍多。汉学家也许会认为这样论证起来繁复非常，但我的目的是帮助非专业人士阅读和理解，让每一章独立成篇。每一章可以独立阅读，如果想深入了解，可以按照文中指引参照其他章节。

[1]利比亚政府在美国的施压之下放弃了核计划，随后即被美国所支持的国际联盟推翻。而朝鲜在美国的重压之下仍坚持其核计划。有一种观点认为，朝鲜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为背后有中国支持，而美国也不敢对朝鲜展开军事攻击。历史证明，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拥有武器永远比拥有盟友更可靠。

第一章 破除关于美国和中国的迷思

为了在后续章节对中美关系进行理性、客观公正的分析，我们有必要在这一章描述关于两国一些迷思的真面目。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在他的著作《编年史》中曾说过，想要对某个事件进行公正的叙述，就要摒弃情绪化，同时不带任何同情或偏见。这很难做到，但若首先破除普遍存在的关于中美两国的一些迷思，我们就很难客观公正地理解和分析中美关系。

概括而言，迷思是对事件、社会现象或人的简化后的呈现，且至少部分基于现实中不存在的因素，因此迷思是谎话、幻象、乌托邦；但当这种迷思一次又一次被重复表达，就有可能被社会中某个群体或大部分人，甚至所有人接受。因此，迷思可以影响社会生活，塑造个人和集体行为，增强社会凝聚力，并且促使现有权力体系合法化。在这一层面上迷思可以被视为等同于或促成了主流意识形态，它可以维持人们对现状的共识。迷思可以是一些人对一系列的“普世价值”的表达，信奉它们的群体有可能想要将其强加于其他群体、民族或国家之上。

有些迷思是完全不真实的，如相信青春永驻；而有些迷思是部分不真实，例如，相信社会进步、自由民主、自由贸易等。^[1]后者是更为阴险的，因为这类迷思部分真实，因此更容易被默然认可，尤其是当其与大部分人的意识形态偏见相吻合时。当我们试图界定迷思是对现实的部分否定还是完全否定的时候，可能会进入一种困境，我称之为“维纳斯女神”困境。在古罗马世界，维纳斯女神是女性美的标杆，^[2]是完美的象征。那么，凯撒大帝的夫人算不算美呢？她也许不如维